

【民族社会】

动态嵌入视角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 高质量融入的推进路径研究

王超 王俐

【摘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是新时期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现有证据表明,城市各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过程中呈现出一种高融入动机、低融入行为的“弱融入”现象,成为制约其高质量融入的关键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动态嵌入视角构建了“经济-社交-文化”维度的梯度模型,用以揭示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基本表征与动态过程,通过对我国东部城市大规模调研分析,实证评估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水平。分析表明,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不足,主要表现为能力融入较为单一、身份融入浮于浅层与情感融入偏好依附。在此基础上,从坚持就业优先、注重社交联动、增进文化认同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与实现各民族深度互嵌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动态嵌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推进路径

【作者简介】王超,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基层统战、社会治理;王俐,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应用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统战、基层治理(江苏 徐州 221116)。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23.10.1~10

【基金项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一般项目“东部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城市融入及就业能力提升研究”(23TZ04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数字强边战略及实施路径研究”(21&ZD163)阶段性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经济条件改善的发展需求,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东部经济发达城市,成为见证、建设和推动我国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群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流动规模持续扩大,超大城市集聚人力资本的虹吸效应日渐增强^[1],印证了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这一基本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引导各民族在互动中加深了解,拉紧共同利益与情感纽带”^[2](P.111-112)]。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同时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3]在此背景下,如何更高质量地促进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水平,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新时期党和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应有之义。

根据人口推拉理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是在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双重作用下形成的社会迁移群体^[4],一般是指“不具备城市户籍,但又在城市居住并从事各种经济、文化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口”^[5]。现实经验表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仍面临着一些适应性困境^[6],如何实现其高质量融入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不难发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过程中容易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从融入动机看,他们希望通过努力工作实现经济条件的改善与提升,从而能够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并共享发展红利。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的分析发现,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迁入地居留意愿高达82%^[7]。与此同时,他们自身又受到来自内外部因素的约束,表现出较低的融入行为。本研究将这种高融入动机和低融入行为之间呈现出的冲突现象称为“弱融入性”困境。这也是新时期推进我国城市民族事务工作亟待关注与解决的重要议题。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融入需求、融入行为与融入环境,以“弱融入性”为观察对象,探讨推进其高质量融入的现实路径。具体来看,旨在解决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在理论解释上,如何从嵌入视角理解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流入”到“适应”再到“融入”的渐进过程,揭示高质量融入形成的动态过程及基本表征;二是在调研分析上,如何评估当前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的现实样态,厘清制约其高质量融入的多重因素。

一、研究基础

长期以来,城市流动人口融入是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关注的重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党的民族工作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8](P.68)},为我们理解与认识新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结构与推进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对此,目前学界关于理解“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不足”这一问题,同样可以基于各民族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予以解释。

(一)环境适应论

环境适应论是从共同性出发来理解各民族流动人口融入问题,即相较于流出地,迁入地城市生存环境对各民族流动人口都会带来适应性挑战,主要包括影响安身立命的生活障碍和制约安居乐业的制度障碍。由于各民族流动人口在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经济、信仰、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诉求^[9],这也意味着他们需要实现劳动就业、制度保障、社会参与、心理认同等多方面的社会融入^[10],但根基未稳的他们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与能力来应对迁入地复杂环境带来的新挑战,也无法快速适应城市新的管理方式和较高的生活成本。例如,一些

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融入中面临着从流出地到流入地生存环境、从农牧民向市民身份等诸多转换问题。加之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门槛较高^[11],建立在属地管理和身份管理基础之上的城市户籍制度带来的“城乡之别”,成为阻碍融入的关键制度性要素^[12],使得他们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保障条件。

(二)心理距离论

对于任何民族而言,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以及生活制度等因素牢牢构成了其社会心理的基础,并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归属,这也反映出各民族心理情感特征所体现出的共同性。从这一角度看,我国少数民族过去长期存在的“聚族而居、共帮而业”的生活方式形塑了特定的群体意识和认知结构。无论是生活工作,还是社会交往,各民族流动人口习惯依赖于传统的亲缘、血缘、族缘、地缘关系来构建和发展各自的社会资本网络^[13]。从流入地居民心理看,由于过去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没有消解,城市居民天然地形成了由“当地人”和“外地人”所构成的社会群体结构认识。一些流入地市民所具有的本地优越感和传统保守观念的存在,使其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14],甚至可能发展成隐性的、固化的地域性偏见。这不仅让城市流动人口嵌入到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面临着更多的阻碍性因素,而且不利于拉近各民族的社会心理距离与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意愿^[15]。

(三)地域文化论

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深刻影响着人们创造物质、精神以及制度等文化要素的意识与方式,从而孕育和塑造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多样,扎根在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在与所处环境的不断调适中形成了边疆民族文化^[16]、西南民族文化^[17]、渔猎文化^[18]、雪域文化、草原文化^[19]等丰富的地域文化类型,它们之间相互交融并存,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生态。与此同时,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各民族在语言、思维及行为认知等方面的客观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各民族群众的就业观、生活偏好、文化

习俗等态度与行为上,一定程度影响了迁移活动意愿与社会融入水平^[20]。而且,由于城市流动人口基本处于大众文化环境下,原有的民族文化习俗及禁忌与现有的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一定的碰撞,往往会影响到甚至阻碍其城市融入过程^[21]。有调研发现,跟家庭随迁或异地求学在城市的少数民族学生在校内生活环境中面临着更多的文化适应性挑战^[22]。

(四)就业能力论

城市流动人口就业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迁入地所从事工作的类型及质量。相比其他迁入地市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来自教育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因学历水平、专业技能、信息素养等方面的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从事职业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23],且难以获得较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24],社会保险等制度性参与水平也相对较低^[25]。在劳动关系上,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成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可能性较低,而成为雇员和失业的概率较高^[26]。另外,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不足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其与其迁入地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能力,并显著影响其收入水平。有研究发现,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每提高一个等级,少数民族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将增加7.5%^[27]。

以上解释为本研究理解城市流动人口融入不足提供了多维的理论解释与依据。然而,现有成果多是从共同性或差异性因素等单一角度展开分析,对于高质量融入的基本表征以及“弱融入性”形成的系统性解释不足,且缺乏基于大规模调研的实证分析。鉴于此,本研究试图构建一种更具整合性的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理论框架并开展实证分析,以回应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模型构建

(一)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梯度模型

嵌入性的概念最初源自波兰尼(Polanyi)关于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到,作为一个制度过程,人类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的^{[28](P.50)},并深刻影响着现存社会结构的特征。这种

非经济制度包括了文化、政治、技术、环境等各方面因素。以嵌入性理解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过程能够有效地将个体特征与结构因素结合起来,业已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在中国情境下,“嵌入”被引入到多民族社会结构的理解上,强调摆脱过去“分隔”与“融合”的二元对立,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多民族社会结构构建模式^[29]。这种模式将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在各民族间的有效流动、配置以及增进各民族的社会认同。城市融入过程并非简单的人口迁移、流动,其内在地伴随着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转移与建构,意味着社会结构的系统调整以及社会资源的再配置。显然,从静态嵌入结构去理解这一过程存在一定局限性。

从动态嵌入角度看,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具有适应性、发展性、长期性的特征,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流入稳定-适应调整-融入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个系统化的互嵌、融入结构体系。这意味着,不同维度的嵌入过程并非同步完成,而是存在一定的层次性和交互性。正如嵌入性理论的解释,经济嵌入是其他要素嵌入的基础和前提,文化嵌入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属于高层次的嵌入目标。社交嵌入则是调适经济嵌入与文化嵌入的重要桥梁。由此,本研究基于从短期到长期、从容易到困难的动态嵌入逻辑,从“经济-社交-文化”维度构建了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梯度模型(图1)。从该模型看,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是一个渐进、递增过程,并依次体现为经济嵌入强、社交嵌入深、文化嵌入足三个基本表征。相反,不同层次的要素嵌入机制出现失效时,则会引致相应的“弱融入性”困境,进而影响其城市融入水平。具体表现为经济嵌入不强导致的融入弱、社交嵌入不深导致的融入浅以及文化嵌入不足导致的融入慢。

(二)模型阐释

1. 经济嵌入下的能力融入

经济嵌入下的能力融入关乎城市流动人口能否“进得来”,是各民族流动人口安身立命和获得城市融入安全感的首要基础。能力融入主要是指城市流

动人口在迁入地生活中维持生计能力的融入水平。这种生计资本和能力是其在流动前或流动中获得的资源、技能、知识等各类资本,是个体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基础要素^[30]。能力融入包含内容丰富,如知识学习能力、身体健康水平、生活适应能力、就业生存能力等。其中,知识学习能力主要受到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身体健康水平是维持工作、生活的基础性条件;生活适应能力是各民族群体与流入地群体在交往交流交融中所具备的基本技能,若能熟练地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能在劳动力市场和工作岗位中更具竞争力;就业生存能力的高低影响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较高的就业能力会使城市流动人口在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2. 社交嵌入下的身份融入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因特定的政治基础、文化习俗、生活方式所形成的民族身份是各民族流动人口与生俱来的特质和属性。身份融入是指在多民族文化融合下所形成的社会交往网络范围的扩大化过程,表现为其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举止方面与流入地社会群体趋于一致的特征,具体体现在其所在地形成的工作网络、社区网络、社交网络等。工作网络是指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同事领导关系网络;社区网络是指依托居住地形成的邻里关系网络;

社交网络是指依托城市人际资源所形成的交往关系网络。从这一理解看,各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以社交关系嵌入在工作网络、社区网络以及社交网络中持续互动、调适与融合的过程。

3. 文化嵌入下的情感融入

文化嵌入下的情感融入是一种建立在文化认同感基础之上的心理活动,能够导致个体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态度等发生改变。它主要是指在城市生活中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反映了其在特定城市环境中的依赖性与获得感。受中国传统熟人社会影响,作为外乡人的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隐形的天然屏障,而情感因素是破解这道“屏障”、实现交往交流交融的非经济性基础,起着不可或缺的纽带连接作用。一般而言,情感融入主要包括:人格尊严、心理情感、工作情感、居住情感等。其中,人格尊严是指作为人被天然赋予的资格和权利应该得到其他民族群体的承认与尊重;心理情感是指在工作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种内在认知及态度;工作情感是指从事的工作岗位所带来的一种心理认可感和满足感;居住情感则是对于自身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

需要指出,这三种嵌入所形成的融入路径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经济嵌入下的能力融入水平提升,会增强流动人口的心理安全感和社会认同感,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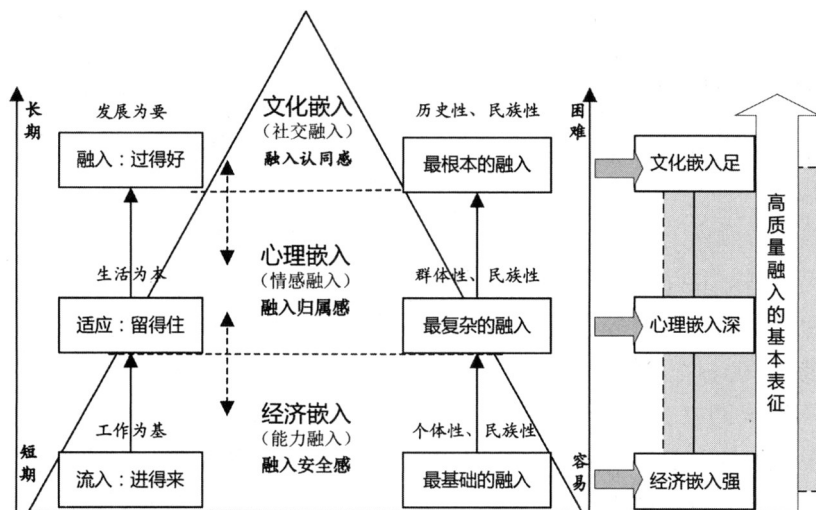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梯度模型

有利于文化嵌入和社交嵌入。反之,能力融入不足则会增加情感融入和身份融入的难度,如语言沟通能力不足会明显阻碍其社交圈的拓展。同样,文化嵌入带来的情感融入有助于提高城市各民族群众的流动稳定性和身份融入水平。这也为揭示“弱融入性”的多重致因以及如何推进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实证分析

(一)调研设计与描述

为了厘清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现状与水平,探究“弱融入性”困境的成因,本研究在遵循结构化、客观化、可验证原则基础上,结合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梯度模型的关键维度,参考相关研究指标,设计与完善调查问卷,确定调研对象、调研内容、抽样方式等内容,征求相关专家、统战部门、民宗部门对调研问卷及实施方案的意见。样本选取范围覆盖居住地类别、职业身份、年龄段、文化程度以及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基本特征,实现了行政区域、人群职业、家庭结构的合理分布,调研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次调研时间为2021年6月到8月,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4496份。

(二)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融入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这也决定了其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具有系统性、层次性。本研究结合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梯度模型,主要从能力融入、身份融入和情感融入三个维度,初步构建城市融入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知识学习能力、身体健康水平、生活适应能力等11个二级指标及其细分的26个三级指标。

(三)评估指标优化

在城市融入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设计完成后,需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优化,通常分为隶属度分析、相关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指标鉴别力分析等四个方面。一是隶属度分析,即根据已有的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各个指标的隶属度,删除数值较低的指标,并保留关键且有效的指标^[31]。本研究采取指标等级分析方法,将每个指标设计成李克特量表,并邀请16位从事统战研究

的实务工作者和学者进行打分,最终将隶属度最低的2个三级评估指标删除,共得到24个具体评估指标。二是相关性分析,即运用SPSS 24.0对各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测算,发现指标之间的Person系数均不显著。三是指标的信效度分析,即运用SPSS 24.0分析发现,各指标的Cronbach的Alpha系数为0.703,KMO值为0.904,说明指标信度与效度较高。四是指标鉴别力分析,即用各指标值分布的离散系数CV_i来度量指标的鉴别力,当某指标的离散系数小于该指标的临界阈值时删除该指标。结果发现,各指标值的离散系数均大于指标的临界阈值。最后,本研究保留了优化后的24个指标,构成了城市融入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图2)。

(四)指标权重确定

权重是反映因素重要性的相对数值。由于评估维度和因素较多,本研究运用层级分析法(AHP)软件Yaahp 11.2设置权重指标,采用1-9的判断尺度作为确定判断定量值的依据。根据各层次评分标准和第一层子目标成对比较,判断优选矩阵,计算归一化权重系数。进一步邀请16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对指标体系进行打分,最后得出:A1=53.90%;B1=16.38%;C1=29.72%。可以看出,经过专家打分后,能力融入在城市融入水平评估中所占的权重最高,而社交融入的权重明显低于其他两个维度。依据上述原理,用同样的方法获取其他分层中各指标权重系数(表1)。

(五)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

在层次分析法中,指标权向量代表判断矩阵中下层指标相较于上层指标的相对权重,这需要计算每一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及其对应的特征向量。通过一致性检验并进行归一化后的特征向量便是所求的指标权向量。确定判断矩阵是否满足具有完全的一致性,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一是计算指标一致性CI。 $CI=(\lambda_{max}-n)/(n-1)$,其中, λ_{max} 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n 为判断矩阵阶数,CI越大,说明判断矩阵越不一致;二是计算一致性比率CR。为了标准化CI的大小,引入随机一致性指标RI,计算一致性比率CR并进行判断,当 $CR=CI/RI < 0.1$ 时,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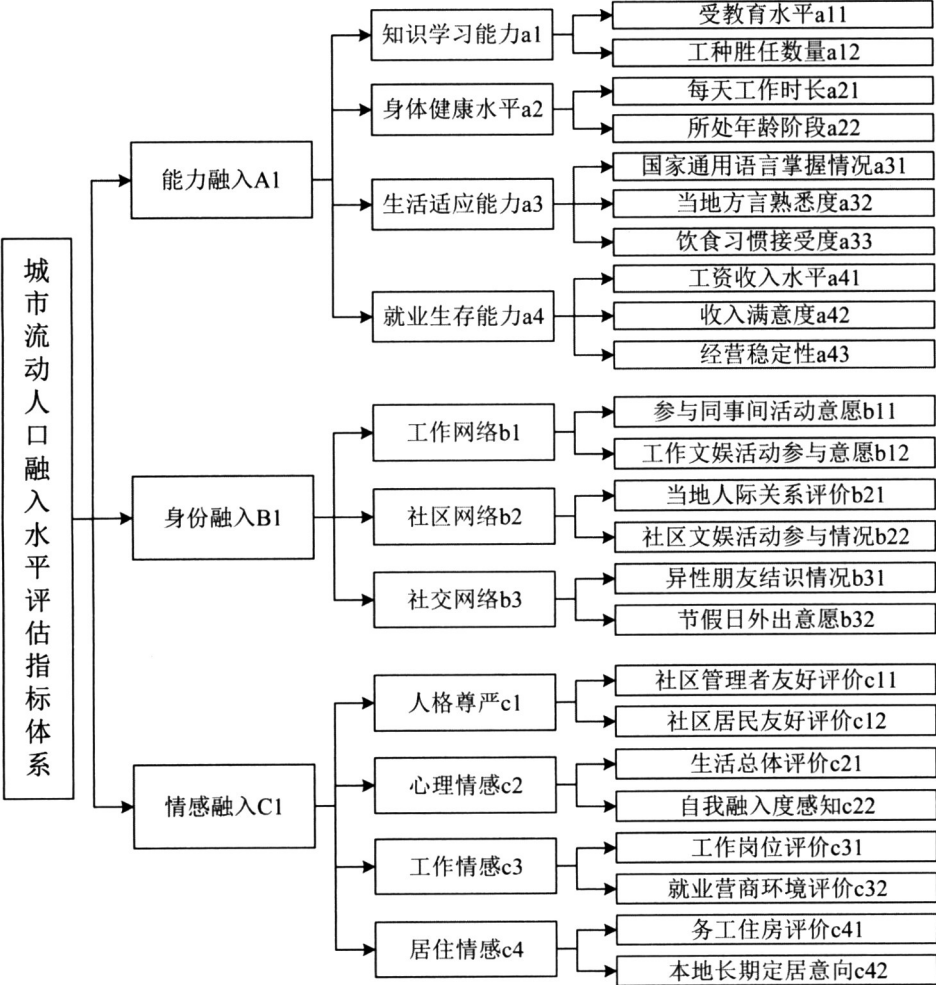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融入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

表1 城市融入水平的评估指标得分情况

一级	三级	均值	权重	分值	一级	三级	均值	权重	分值
能力融入	受教育水平	3.8868	0.1043	8.1079	情感融入	生活总体评价	2.0525	0.0586	2.4055
	工种胜任数量	2.5687	0.0521	2.6766		自我融入度感知	2.1619	0.0293	1.2669
	每日工作时长	3.2601	0.0149	0.9715		工作岗位评价	3.2269	0.0310	2.0007
	所处年龄段	3.0988	0.0597	3.7000		营商环境评价	3.1557	0.0078	0.4923
	国家通用语言掌握情况	1.6957	0.0595	2.0179		务工住房评价	2.1152	0.0158	0.6684
	当地方言熟悉度	2.8687	0.0103	0.5909		本地长期定居意向	3.2362	0.0315	2.0388
	饮食习惯接受度	3.2017	0.0176	1.1270	身份融入	参与同事间活动程度	2.8055	0.0723	4.0568
	工资收入水平	2.1697	0.0351	1.5231		工作文娱活动参与度	3.3678	0.0241	1.6233
	收入满意度	2.3685	0.1298	6.1486		在当地人际关系评价	1.8261	0.0087	0.3177
	经营稳定性	2.6855	0.0555	2.9809		社区文娱活动参与情况	3.3589	0.0174	1.1689
情感融入	社区管理者友好评价	1.9359	0.0616	2.3850		异性朋友群体结识情况	2.6031	0.0137	0.7132
	社区居民友好评价	1.8261	0.0616	2.2498		节假日外出意愿	2.21938	0.0275	1.2200

判断矩阵的一致性符合要求。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出权重向量为 $\omega=(\omega_1, \omega_2, \dots, \omega_n)^T$,进而根据公式计算最大特征值: $\lambda_{\max}=\sum_{i=1}^n \frac{[AW]_i}{nW_i}$ 。其中, $[AW]_i$ 代表AW的第*i*个因子。在本研究中, $n=3$, $RI=0.58$,计算后最大特征值 $\lambda_{\max}=3.0092$,一致性指标 $CI=(\lambda_{\max}-n)/(n-1)=(3.0092-3)/2=0.0046<0.1$ 。进一步计算一致性比率: $CR=CI/RI=0.0079<0.1$,这说明通过一致性检验。

(六)融入水平综合评分

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规则,评估体系将城市融入水平划分为I-V级共5个等级,各指标评价的5个等级构成了5个区间[1, 1.5]、[1.5, 2.5]、[2.5, 3.5]、[3.5, 4.5]、[4.5, 5]。其中,每个区间分别对应I级(非常差)、II级(较差)、III级(一般)、IV级(较好)、V级(非常好)共5个等级。将三级指标进行标准化之后,计算出每个指标的均值,并与其对应的权重值相乘,就能够得到相应的城市融入水平的评分。结果显示,城市融入水平的总评分为52分,其中能力融入为30分、身份融入为13分、情感融入为9分。这反映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处于一般水平,和目前学界的经验认识相一致^[32]。其中,能力融入水平最高,身份融入水平次之,情感融入水平最低,这与本研究所构建的融入梯度模型划分层次具有一致性。

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不足的成因分析

(一)经济嵌入不强导致能力融入较为单一

生存能力是个体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求。调研显示,“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是推动各民族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占比达61%。但在少数民族人口涌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受到城市就业市场环境的影响,也在进行自我限制^[33],呈现出能力融入单一特征。具体来看:一是自身劳动力素质技能不足。调研显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地区(占比74%),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存在一定的信息工具使用障碍(占比29%)。

同时,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融入地方语言环境是进入城市的第一道关口,语言不通往往使流动人口寸步难行。有25%的调查对象表示难以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听说读写能力,对于地方方言的熟悉程度更低。二是就业渠道有待拓展。择业渠道受限往往使得他们的就业信息主要以亲朋和同乡介绍等非正式渠道为主,大多沿着本民族、原籍地同乡的惯性行业,以职业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体力劳动为主。调查显示,他们从事工作的职业类型最多的是“产业工人”(占比21%)与“住宿和餐饮从业者”(占比19%)。三是收入水平有待提升。调研发现,东部沿海城市有53%的群体月收入不足4000元。而且,部分已经在流入地城市工作生活十年以上的务工人员,其工作收入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未体现出工龄经验带来的收益附加值。

(二)社交嵌入不深导致身份融入浮于浅层

目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通常以群体性方式嵌入到城市产业链和工作网络,并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根本、以同族同乡关系为依托的社交网络。这种相对稳固和封闭的社交网络在保护自身减少外在压力的同时,也将自身天然地隔离在城市生活之外。一是自我身份认同较低阻碍工作网络拓展。调研数据显示,有64%的调查对象认为,其民族身份并不有助于求职和工作。这主要来自于自身的就业能力和条件不足。其中,文化水平不足是最为显著的原因(占比52%)。二是民族传统习俗多元化导致社区网络融入慢。生活习俗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不同民族之间在语言、饮食、居住等习俗方面有待交融。有37%的调查对象认为风俗习惯对其所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具体表现在语言障碍(占比21%)、饮食习惯(占比27%)、宗教信仰等。三是社交网络圈层有待拓展。社交融入意味着少数民族实现了由身份认同、角色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转变,一定程度上以新市民的身份代替了外地人和流入人口的城市身份标签。然而,由于语

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原因以及互相扶持的需要,部分交友带有一定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偏好。调研也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在流入地的异性朋友主要来自同乡和同事关系。

(三)文化嵌入不足导致情感融入偏好依附

文化嵌入下形成的情感融入过程具有长期性、历史性与复杂性特征。因少数民族流动群体在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出的差异,使其在流入地形成的群聚现象带有一定的族群特征,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族群性网络^[34]。一是流入地居民的社会认同低影响社区融入动力。调查显示,有20%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尚未积极融入当前所在城市生活。同时,部分流入地社区居民对于外来流动人口的关心与帮扶不够,减弱了少数民族自愿融入社区生活的积极性。二是民族身份带来的心理情感融入不足。他们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对其完全融入城市生活造成阻碍。调查显示,有28%的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习惯集中用餐。三是高昂融入成本加剧了族群聚居现象,降低了城市居住情感。调研显示,有本地长期定居计划的占比70%,但高企的房价、单一的就业技能、属地化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阻碍了这一意愿的顺利实现。特别是“没有住房”(占比19%)、“消费水平太高”(占比13%)成为其中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也导致更多流动人口倾向于聚居生活方式,以家庭、亲朋好友为主或以同乡、同族为主,情感上相互依附、生活中彼此扶持。

另外,在地化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足也制约了融入水平的提升。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阻碍的突出表现是公共服务不均等。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在城乡一体、跨区域结算上存在诸多障碍,城市流动人口能够享受的社会保障范围不够明晰,缺乏统一的制度规定。调查显示,未参加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4%、28%、61%。进入城市就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缺乏社会综合保障,容易对未来的生活产生顾虑,难以

安心地融入城市。

五、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就业优先,持续提升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能力融入是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基本内容,也是保障情感融入和身份融入的先决条件。一是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依托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培训班等形式,举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提升儿童和青少年群体语言表达能力。二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长远来看,依靠单一的就业渠道与职业类型来实现生存发展,不利于城市融入的稳定性和多元化,这需要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加强面向少数民族群体的职业需求开展培训。依靠地方政府与民宗、统战部门合作协调,发布针对性的就业信息,提供就业辅导,积极调动地方企业、民间组织参与,吸纳各民族流动人口参与到生产活动之中,形成各民族互惠互利的合作局面。三是实现就业精细化管理。搭建“一站式”服务平台、服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创业就业服务平台等,逐步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经常性开展就业经营现状及就业需求调查。

(二)注重社交联动,搭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互嵌式社区

社区是各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基本单元,如何让其“稳定”下来,需要做好城市社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不断提升多民族社区管理服务水平,关注社区流动人口的思想动态与利益诉求,构筑多民族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加大宣传各民族流动人口对丰富城市文化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贡献,提升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二是以互嵌式社区建设为切入点,促进各民族群众从空间融合走向情感融合。通过培育以“红石榴家园”为代表的社区民族工作品牌载体,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知识竞赛、文化传

播等宣传教育活动。在社区层面常态化开展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和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提升城市融入归属感和居住情感,实现各民族流动人口的在地化融入。三是将对社区少数民族管理服务水平纳入社区人员管理绩效考核之中,促进社区各民族流动人口与社区管理人员形成紧密的党群干群关系,营造社区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格局。

(三)增进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共有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35]。文化嵌入下的情感融入是推进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一是探索建立党建引领的民族文化培育机制,积极吸纳各民族群众参与,宣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引导各民族群众相互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开展结对帮扶行动,建立网格责任共同体机制,在促进就业技能提升的同时,增强对城市文化的融入。组织参观游览博物馆、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介绍和讲解党的惠民政策以及关于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基本观点。二是推广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让更多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走出家族网络、同乡网络,走进更广阔的社交网络。三是尊重和包容民族的差异性,打造民族文化共同体,培育形成更具包容性的民族文化生态。依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加大民族团结互助文化宣传,尊重各民族的重大节日,加强邻里守望的睦邻互助文化形成。

(四)完善基本保障,加快各民族流动人口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础性生活保障是各民族流动人口留得住、过得好的重要前提,这需要全面提升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覆盖水平,保障各族群众的平等权利,增强各族群众城市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是树立以服务促管理的民族工作理念,探索现代城市流动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创新,着力解决城市流动人口在就业创业、教育医疗、住

房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保障各民族流动人口诉求渠道的畅通性,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促进民族事务工作服务质量提升。二是坚持精准帮扶,建立并启动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平台,开展社区范围内少数民族群众基本情况摸底,充分掌握其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与思想状态,以主动关怀的工作态度为困难群体排忧解难。积极帮助城市流动人口解决社会保障、子女上学、法律援助等实际问题,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会同工会、妇联等共同探索大病医疗互助保险。三是将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各族群众需求相结合,建立健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 service 管理体系。

六、总结与展望

作为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一种新表征,“弱融入性”是新时期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工作面临的关键问题,也是实现城市各族群众高质量融入的必经阶段。本研究从动态嵌入视角构建了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的梯度模型,用以阐释高质量融入过程的渐进性、动态性和发展性特征。结合调研发现,在内外环境因素综合影响下,城市各族群众在经济、社交以及文化层面的互嵌性不够,表现为能力融入不强、身份融入不足、情感融入不深。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从坚持就业优先、注重社交联动、增进文化认同以及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推进路径。这对于在我国城市民族工作中坚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增进共性、促进一体,不断优化我国城市民族服务与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在未来,如何根植于我国民族工作实际与城市管理政策现状,积极顺应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聚居趋势,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智慧和实践经验为指导,以城市流动人口高质量融入为出发点,以“经济-社交-文化”多重嵌入为重心,探讨和解决城市少数民族高质量融入所面临的结构化、制度化困境,构建与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仍是学界与实务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 [1]谭杰.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研究:范畴变迁、实践审视与演进方向[J].南方经济,2021(8).
- [2]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 [4]史诗悦.社会资本视角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基于义乌的考察[J].回族研究,2021(4).
- [5]秦文鹏.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社区策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5).
- [6]张志泽,高永久.城镇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7,38(4).
- [7]马忠才,郝苏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与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9(4).
- [8]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
- [9]吴泽荣.新时代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与共建共享——以广州回族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6).
- [10]淦宇杰,张龙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分析——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9).
- [11]陈春艳.铸牢城市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困境及路径[J].民族学刊,2022(10).
- [12]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5(2).
- [13]张立哲.新疆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在当地交往交流交融实证研究——基于广东、江苏、安徽等地的调查[J].新疆社会科学,2018(1).
- [14]陈茂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心理基础——基于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视角[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15]陈立鹏,薛璐璐.民族心理距离视域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 [16]常永才,仲丹丹,刘珂瑗等.内地中学生对边疆民族文化元素多样性和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感知——基于跨文化心理学普同观的问卷调查[J].民族教育研究,2022(6).
- [17]于良楠,李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云南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研究与思考[J].民族艺术研究,2021(5).
- [18]郝帅.黑龙江省乡村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以大兴安岭十八站鄂伦春族民族乡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2).
- [19]于佳宾,王宇航,范喜春.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路径探析[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1(1).
- [20]盘小梅.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民族文化变迁——以广东连南瑶族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19(2).
- [21]李钰,李维彬.民族学生就业中的民族文化影响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16(2).
- [22]张广利,万胤婕.差异与互融:内地高校少数民族学生的适应性危机及应对——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22(2).
- [23]李吉和,周红英.湖北省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及特征——基于最近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
- [24]李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其决定因素[J].西北民族研究,2020(3).
- [25]赵玉峰,扈新强.流动人口社会参与的民族差异——基于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的实证研究[J].西北人口,2019(2).
- [26]谢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 [27]姜太碧,刘嘉鑫.城市少数民族汉语能力与收入效应分析[J].民族学刊,2020(5).
- [28][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9]郝亚明.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3).
- [30]朱军.新型城镇化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计资本与就业状况研究[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 [31]陈光普.社区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20(1).
- [32]冀慧珍.获得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标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
- [33]李伟梁.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2).
- [34]孙婧,刘东旭.网络社会的认同重构:理解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群聚现象的一种路径[J].青海民族研究,2019(3).
- [35]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中国宗教,2021(3).